



江鸟集

李群鸿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江 鸟 集

李群鸿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鸟集/李群鸿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671-2313-7

I. ①江… II. ①李…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7049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江鸟集

李群鸿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98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313-7/I·436 定价: 30.00 元



作者简介

李群鸿，男，1943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2003年在上海滚动轴承厂工作，在车间工作十年，“文革”后担任工厂中层干部，历任厂教育科科长、厂技工学校副校长、厂长办公室主任等。2005年不幸中风，虽无性命之虞，但留有严重的后遗症。

老闵行的人，那事，那景(代序)

郑 宪

45年前(1971年)的老闵行是一种什么味道?上海人对当时的老闵行是怀着一份骄傲的:先进的工业基地,大型的机电制造企业,种满香樟树的宽阔的一号路(现为江川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意气风发的小青工,一幢又一幢的工厂宿舍楼。厂门口下班的情景令人激动,人海奔涌,如潮的自行车破门而出,带着尖锐欢快的响铃口哨,穿云破雾。

老闵行还靠着叫西渡口的黄浦江,浊浊黄水,摆渡轮来来往往,过了江就是奉贤的乡下,奉贤那边最出名的地方叫南桥。我们一直将老闵行视为“城市”,周围全是乡下。从地理上看,即便从真正的上海城区到老闵行,当中还隔着上海县(现为闵行区)。从徐家汇出发去老闵行,便是从一个城区起始,经过上海县的乡下,走一半路程的地方是莘庄。当时的莘庄多小啊,标志是一个道路拐角的几幢矮旧房子,一个可以寄信的简陋邮局,一条过火车的铁道线。然后继续前行,过颛桥、北桥一些乡下旮旯,到达老闵行时便心生快感: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城市地盘,道路清爽、绿荫繁茂、厂区宽敞,高大齿状的厂房幢幢耸立相连。一号路上有一长溜干净的百货商店,有在上海也叫得响的饭店“老正

兴”，有正宗的点心店，好吃飘香的清真牛肉面馆。那城市味道还反映在一个个大小厂区内行走的工人们身上，完全的国家主人翁状态，领导阶级的昂首挺胸气质。

我在 1971 年住进了在一号路与兰坪路交叉口的上海滚动轴承厂男宿舍楼。那宿舍楼里的气息是各种味道的混合。房间有大有小，大的住十多人二十人，小的四五个到五六个人，但一律的上下铺。用现在的形容叫人挤人、挤死人，用当时的话是团结、紧张、节约、紧凑。没有人抱怨这样的环境，大家挤在一堆爬上铺、睡下铺是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工厂实行早班和晚班制，工人一般一个星期上早班、一个星期上晚班。早班是上午 7 点的班，工厂车间和宿舍之间走路距离 45 分钟左右，算上做各项卫生和吃饭事宜，提前到清晨 5 点多起床是必需的。晚班是下午 4 点上班、晚上 12 点下班，回到宿舍应该是凌晨 1 点以后了。就是说，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工人都受到两班倒的影响，集中点在清晨 5 点和凌晨 1 点。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两班倒，你影响别人，别人也影响你，那就没有影响的感觉了。起床和回宿舍，所有人都自觉默契，轻手轻脚。简陋的洗手洗衣间和卫生间是公共的，水槽一长溜，便池一长溜，使用敞开又集中。当年，40 岁以上的住宿舍的老工人往往是家在长三角外地的乡下人，年轻的工人则多来自上海。老工人一般都节约，在厂里工作时吃食堂，在宿舍吃饭就点个小煤油炉，自己煮菜烧面，所以一进宿舍楼，浓重的煤油味和米香、面香味冲鼻而来。

我刚入宿舍楼住的是间典型的大房，十几个人，靠着东面的窗，睡下铺。我的上铺是大我近 20 岁的金文华。他的床铺干净

无尘。我和他是在换到一个晚班时的白天开始说上话的。那天他倚在床头，手里拿着本理工类的书，和我这个刚进厂的“小阿弟”搭腔。我觉得他说话的口气很放松，慢条斯理，有教养、有内涵，内含一丝丝傲气。姓和名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的腔调是我应该对他有所耳闻，可我当时非常自我且深度沉默，因为家里受到“文革”冲击，年纪小小的青工情思幽忧，除谨慎谦卑地聆听，别无主动表达。所以半自闭症的我对金文华一无所知，让他多少感到有点无趣失望。

之后便见到了李群鸿。隆重介绍李群鸿出场的是同宿舍大我3岁的陈惠敏。小白脸的陈惠敏最先欢迎我的到来，说本宿舍总算来了一个比他更小一号的主，那些为人民服务如泡热水之类的活计可以有所分身。算算年龄，我当时17岁，他20岁。他介绍我们宿舍有好几个藏龙卧虎的“真人”，首推便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群鸿。那时在工厂，大学生是天上的云。我们在革命岁月长大起来，和知识隔开千万里，心里想着强大，存着野心，其实一滴学问的墨水也没滋润到心田。当李群鸿在陈惠敏的介绍下站立到我跟前时，我竟很平静，因为李群鸿没一点正宗大学生的腔调：背带工装裤，粗胖的形态，憨直的笑容，随随便便的口气，亮点处是一双眼睛凸出炯亮，却也透满善意和温润。如此，196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的李群鸿以一个普通工人的形态进入了我的生活视野。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我的上铺金文华的：“金老师很会说话的。”“嗯，他不一般。”噢，在这工人宿舍，在我周围，到处有不一般的人呢。陈惠敏笑插了一句：“他是真正的小开。”李群鸿进一步补充：是有本事的红色资本家；家

族自他以上,解放后一直拥护共产党,曾经是上海公私合营的典范。至于现在的金文华住在工人宿舍,真正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再正常不过了,改造很彻底了。“所以,金文华真不是一般的人,他值得你交往。”

那年我虽不谙世事,却对“身份有疑的人”不排斥。宿舍中自然有正宗的工人阶级的人叫我不要和“资本家”的金文华多往来,尽管他和其家庭有过“红色”的标记。但我不排斥这个“红色小开”。他们家以前剥削工人是一回事,而现在他早停止剥削了。你看,他每天都很辛苦地在我的铺位边爬上爬下。他讲话虽然响亮,但也风趣,也时有智慧,还略带嘲讽。他讲大学生李群鸿,客观并抱着敬意。“李群鸿长得像个普通工人,其实他干的就是普通工人的活(当年李群鸿和他一起在滚柱车间当工人)。他是个大学生,书法好哦?文章好哦?写的古诗现代诗好哦?他看的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人家看得懂哦?”他这样一条条跟我说。他还说李群鸿是“发配”到工厂来的,出身很差,自己在大学读书不甘寂寞,在政治上冒了一下犊头,不小心额骨头碰了个大包,结果下放当工人了。厂里宣传科的位子,没有,厂校老师的位子,不给。“好了,小阿弟依看看迪个社会,好白相哦?”我没有觉得好白相,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社会有问题,一个厂里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大学生做了好多年的工人,这对吗?我是分配在全厂最苦力的锻工车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上班前要在又小又脏的更衣室里拿一本红宝书,反复学习背诵语录,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另一个人永远健康,然后才能进车间干活。我对此心不在焉,心里抗拒那些祝福,把嘴巴闭牢,有时还打瞌睡。但我对当一个工人还是

自豪的,因为这个社会都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李群鸿大概看见我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喜欢下班后坐在宿舍里静静地看书和写几个字,便有意调教我,既给我看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的诗,也给我看艾青、贺敬之们的现代诗词,并给我看他自己写的励志型或感叹性的古诗,贺敬之式的豪情万丈的阶梯诗。他一方面要我很尊重金文华,又对我说,你不必和他走得过近,金文华的一些话可以听,但不要去随意传播。智慧的人是把别人智慧的话印到脑子里;智慧的人除了调侃一些人和事,更要主动地在社会上发出自己一些积极的声音,即便这个社会好像很亏了你。我说我脑子清爽的,但这不影响我和金文华之间开展的一些交互活动,比如他曾经带我一起骑自行车过黄浦江,一路骑到乡下的南桥,从船上的农民手里直接买来河里捕上来的大闸蟹,再带回宿舍里煮着吃。彼时两耳未闻阳澄湖,味道照样鲜得来;那一路上还听他扯天文地理,很受用。

所以在宿舍里,我对小白脸陈惠敏好,因为他很真诚,很率直,连他自己经历跌宕的爱情故事也会对我情节加细节地讲述。我对金文华不反感,他的话语风趣而智慧,圆滑而活泼,尽管他的身份有人睥睨。我对大学生李群鸿一直感到亲切而敬佩,比我大十多岁的他非常平等地与我交流。在外人看来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在工厂里干活,但各人都有自己辛酸苦痛的故事。尤其是李群鸿,他私下应该痛楚——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为自己曾经在大学“额骨头被打成大包”的经历,但厂里总是活跃着他的身影,他走路的模样总是欢快的,他不是厂里宣传科的人,但宣传科的领导或成员一直在“临时借调”他,让他去工厂大食堂外一块大黑板

报上贡献力量。那黑板报上用各色粉笔写得龙飞凤舞的字和美术设计几乎都出自他手，他昂扬地反映工厂工人车间生活的诗歌，一首又一首地出现在板报上。我觉得他深刻地影响了我。可能我不一定欣赏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但他的总是向上乐观及苦难中活出坚忍的人生态度一直在鼓励我不弃前行。

之后便遇到了朱国明。朱国明细芦杆子高的一个人，前胸贴后背的瘦，脸上几乎不见笑容，就觉得是不是长期没吃饱饭才闹成这么个形象。尤其和李群鸿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的反差，干脆去舞台上唱一段形象背反的相声。但李群鸿叫我充分重视朱国明的才华。李群鸿说，“朱国明的写作才能不可多得。”大我四岁的朱国明不住在一号路上的工厂宿舍，而住在沪闵路工厂内的消防队宿舍。我们见面比较少，他和李群鸿一个车间。不知道是不是高傲，还是认为我这个小毛孩没啥交朋友的价值，反正起始他毫无表情地冲我比较远的方向点个头，算从此相识，眼光马上游离到别的地方，一副懒得与我说话的腔调。以后有了个机会，李群鸿、朱国明和我加入了一个老闵行工人诗歌创作队伍的培训，上海人民出版社几位专业老师来指导我们，其中有“获得解放而重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全一毛、王华良等新闻文坛老前辈。那时候要出版的是一本叙事诗诗集，书中麇集老闵行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锅炉厂所有万人大厂及我们一些中型企业的业余诗作者。我应该是其中年龄最小者。

李群鸿的眼光真的不错，朱国明在此时显山露水了，初稿一露头，即被那些文坛老师铆牢，文字好，题材好，情节好，标题

好——这标题后来直接做了书名：《雏鹰》。我们不大不小的上海滚动轴承厂在此书中大出风头：朱国明的诗文挑头挑大梁，重中之重；我的一首诗，则在李群鸿的扶持修整下，也在书中占了一席之地。那处女的诗作不知修改了多少遍，最终见了天日，时间在1974年7月。那时的叙事诗，别具一格，且看文字斐然的朱国明在《雏鹰》中的最后两节——

大锤师傅敞开胸怀，
一江波涛在胸中翻腾，
是啊，要迎着大风大浪翱翔万里，
勇敢的雏鹰还刚刚启程……

这时，天角边闪耀着一颗启明星，
云蒸霞蔚的地平线正孕育着金色的朝曦，
收音机里传来雄伟的《东方红》乐曲，
啊，迎接他们的，又是一个金灿灿的黎明！

我们看朱国明闷屁不响一个人，脸上不露一丝感情，但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文字出来，吓周围人一跳，温度比炉膛里的火还要高。

那天王华良老师就对我说，为了你这只冒头的小雏鹰，李群鸿坚持不上自己的名字，坚持退出，“要好好谢谢你的伯乐李群鸿”。那时的感谢没有物质的成分，只有在内心。出书那天我们三个人——李群鸿、朱国明和我，来到老闵行一号路上的公园：

红园。那园子不大,小巧雅致,秋天的园子,枫叶如火。有几乎大半年的创作期间我们三人经常到此,连休息天也不回上海市区,在这个静谧美丽的园子里看书、阅稿、溜达、商议、争论,寻找炉火熊熊般革命诗句的灵感。至今回想,那日子值得久久回望。那是我们各自走向文字生涯的原初美味。我觉着朱国明还是那般安静,目光深邃远眺,应该在树立高远的目标。李群鸿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书中,却显得比谁都高兴,高兴得十分真诚。我当然觉得那天的日子和园中盛夏的景色与往日迥然不同的。那年我20岁,我的生日也在流火的7月。生命在此时灿烂了一下。我想我是下了一生要做什么事的重重决心的。

一件事是让我感觉到很深的缘分:随后几年,我和朱国明在恢复高考后参加了考试。朱国明1978年考入大学,离开工厂。我在1979年考入大学,离开工厂。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甚至我进大学前都不知道朱国明进的是什么学校。但我踏入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竟然在校园的一处学生宿舍楼不期而遇到朱国明——我们进的是同一所学校的中文系。而这所大学,是李群鸿十几年前毕业的学校。所以说,和朱国明,我们在工厂一直没有走近。不大不小的工厂,都喜欢文学和写作,但彼此的关系依然总是不咸不淡。即使和李群鸿,因为我之后在厂宿舍楼找到另一个环境更好的朝南小屋,便搬出了共居一室的大房,又不在一个车间,关系也若即若离。彼此当然互相观望关注。那天在师院的校园里和朱国明见面,从黄昏逛到夜晚几个小时,感到一种亲切,说现在我们自己也做梦一样成了“大学生”,而原来引领我们的大学生李群鸿却依然在老闵行的工厂。

时光往前不停驻，但许多的人和事在发生翻覆的变化。

日子以后便转动得很快速，然而，对于我和已经离开的老闵行，和很少相见的上海滚动轴承厂，和相距更远的李群鸿，原来密切的关联与牵扯，戛然而止。直至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在上海长宁古北地区，再一次见到了朱国明，应该是2001年上下，我们在又一条马路上突然巧遇，他依然细芦杆子一个，添加的是满头华发，我却有些发福，但彼此还是一眼相认，并得知两人的住家就在紧紧相邻的两个小区。惊异欢笑。他不再很严肃、很矜持、很漠视。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去了上海市档案局，以为是个枯燥的地盘，却干出了有声有色的和文学影视有关的事业，将沉睡尘封于档案馆内的地下党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编剧演绎成好几部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而我，当了近20年的报社记者，用朱国明的说法：“不见你的身影，却经常看见你在报纸上洋洋洒洒的文章靓影。”那话题，马上转到了依然在老闵行的李群鸿。说他最终成为工厂的宣传科科长，也入了党，也在厂里教过书，也培养了一批批的文学爱好者，桃李满天下，也写一篇篇直抒胸臆的文字文章。他从此没有离开老闵行一步，生活，工作，事业。彼此说，什么时候再去老闵行，看望我们心中的大学生。人已在东西，遥望不忘记。

朱国明和我，偶然相遇，惺惺走近，但我们，终于没有约在一起去看望李群鸿。

再以后，我得悉：退休后的李群鸿病倒了。

以下的描述，换一种方式进行，主述者是李群鸿的妻子。李群鸿的妻子也姓李，叫李丽英：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比李群鸿

小8岁的女人，一个曾经和李群鸿同一年进工厂进一个车间工作的女人，一个对沪剧痴迷疯狂的女人，一个48年生活在老闵行行的女人，一个坚强快乐的女人。

以下择要而录的几段话，是李丽英在我最近一次到老闵行看望李群鸿时说的——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不屈服自己命运的评选，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李群鸿——我的丈夫。

十多年前，他严重中风，右半边身体全瘫，话语功能丧失，而且伴有严重的糖尿病。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不好。

这一辈子，我就是他的福气。他倒下去，我叫他挺起来。他右手不能写字了，我说，你还有左手可以写啊。所以，每天家里的钟指向凌晨4点，李群鸿就起床了，在书房左手用钢笔，一笔一笔，端端正正地写字一小时。接下来他走路，我在大门外给他按了两个圆铁的扶手，他就可以自己借着力下几级台阶走到大院里了。李群鸿做所有的事情，不要我帮他。我就说，你走啊，走得越多越有希望，几天就走坏一双老布鞋。健康要走路，不要停下来。对的，他就是摔倒了，不要我去扶，我也不去扶，有时候人摔得鼻青脸肿脚出血，我心里痛，眼睛装作没看到。

他说话不清不楚，只有我能听得懂一些，但他听得懂别人的话。所以我对他说，你一天也不要倒下去，好

不好？我们一起努力。

回想这一辈子，开始就是我倒追的他。你们看，李群鸿年轻时不算好看吧？在工厂的时候，粗黑黑的，像一个打铁工。但他是个大学生啊，有知识。那时社会上有几个真正的大学生啊？男人要好看干什么？他能吃苦，又有文化，写诗写字都好，就是他出身很不好，当时他的爸爸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有人躲开他，我就要接近他，为他烧饭、洗碗、洗衣服、整理房间。他接受我，我就是感觉幸福。

去年，李群鸿 73 岁了，中风已经十多年了，我们全家带着越来越健康的他，登上海轮出国，去韩国、日本。上船的那天我对他说，你幸福不幸福？没想到他一字字地说出来：“我幸福。”我听到了，当时哭得一塌糊涂。

一个人要健康，精神愉悦很重要。最近我们家会有一件大事要发生：李群鸿要出一本散文集了，书名叫《江鸟集》。他就是一只江鸟，也是他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分解。江鸟就要飞，不想停下来，那我就给他做一对翅膀吧。我们的女儿，把他过去几十年写的文章一个个字地打到电脑上。这些天，我一边看他的文章，他写的故事，一边泪水止不住地流啊流……

哪一天，我想要叫上朱国明，叫上金文华，叫上陈惠敏，叫上李群鸿在老闵行曾经的和现在的朋友们，我们要和李群鸿、李丽英一起，好好聚一场！

爸爸的“写读人生”

李彦

说来惭愧，我从来没有想过能为爸爸做些什么，这次是爸爸的朋友来看望他，见到了他的一些手稿，建议我们可以为他出本书，于是妈妈整理了部分资料给我。现在爸爸的书终于要出版了，多谢爸爸的各位朋友和同事的鼎力支持！可能爸爸自己都没有奢望过他的书能够正式出版，虽然我知道他曾经这样想过，也曾经去努力过。

爸爸一直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可是世事弄人，年轻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直都郁郁不得志地在车间工作，直到多年后才重新回归到文化人的队伍中。其实就爸爸的形象，当工人还真不委屈他，浓眉大眼，身体强壮，一看就是老电影里工人阶级的代表。虽说那时候心里憋屈，可不幸中的万幸，是他认识了我的妈妈，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相爱相杀、斗智斗勇的婚姻生活。爸爸一直对生活上的事少根筋，不会做家务，不会“扒”分，让妈妈颇多埋怨，可他们俩人的共同点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爸爸虽然不像妈妈那样爱揽事，但只要有求于他的、他能帮上忙的，都会尽全力去做。有次帮烧伤的同事女儿写申诉，获得了一笔不小的经济赔偿；还有为亲戚写补助申请，以渡过生活的难关。